

【法学研究】

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演变

彭湘蓉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战争、国家机密、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下,新闻自由将受到约束。从哲学维度探讨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天赋观到法律框架下的自由观,再到社会责任论下的自由观,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不断被充实,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表明,新闻自由权利不可滥用,不仅要受到法律限制,还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的要求。

关键词:政治学;新闻自由;限制性权利;法律;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DF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7)02-0072-04

Restrictive right-evolution of news freedom

PENG Xiang-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News freedom is a kind of limited freedom. Under the situation of war, state secrets, and public interest, and with the lac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news freedom will be bound. From the angle of philosoph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strictive right-evolution of news freedom from naught to its formation, from the original idea of God-bestowed right to the free idea in law structure and to the free idea un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restricted rights of news freedom is continuously enriched but accords to the require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strictive right indicates that the free right should not be abused and it should not only be under the confinement of the law, but also accord to the requirement of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and social and moral standard.

Key words: politics; news freedom; restrictive right; law; social responsibility

0 引言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新闻的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媒体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这种权利被视为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既是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信任和

尊重,也是衡量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的深刻洞见是:“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1]。

但与此同时,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遇到诸如战争、国家机密、公共利益以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或道德等情况下,新闻自由将受到约束。这就是与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相对而言的——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即“媒体不能够做什么,或政

府告知如何做的权利”^[2]¹²。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表明,新闻自由权利不可滥用,新闻自由不是主体的随心所欲,应是自由与规范的统一。从最初新闻自由的天赋观到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再到社会责任论下的新闻自由观,新闻自由的限制性权利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充实、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过程。

1 无限制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精神的源头要追溯到欧洲大陆。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活字印刷术的革命性进步推动和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导致生产效率极大的提高和印刷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使得书籍等印刷品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打破了贵族和僧侣垄断知识的局面。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许多传统的社会习俗慢慢开始演变,社会变革随之产生。“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在1520年之后广泛使用印刷品在德国乡村传播新教教义,这些印刷品被大量复制,在信众中广为传阅,在某种程度上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成功要得益于印刷术的革命。因此传统的精英集团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印刷界打破常规的诉诸情感的做法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亨利八世很快采取措施对英格兰的印刷业实行限制”^[2]⁴。1530年第一个出版许可证制度在英国建立,新兴市民阶层随之展开了漫长的争取出版自由的政治斗争,要求废除皇室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思想解放,古典新闻自由思想的大门由此开启了。

1644年11月,英国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奠基人约翰·弥尔顿发表了久负盛名的著作《论出版自由》,其观点是,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人人享有这种权利,自由是人类全部幸福的保证,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任何书报检查制度都是对真理的查禁^[3]¹⁷⁶。这是关于新闻自由思想的最早的理论论述。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还有约翰·利尔本,他在《英国的天赋权利》中主张出版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并在1649年的《新人民公约》中呼吁给出版自由以法律保证。当国会以叛国罪的罪名逮捕利尔本时,他在法庭上的精彩辩论使法院不得不释放他,并由此确定一条原则,即在出版物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不算犯罪^[4]。新闻自由的天赋论强调,新闻自由是一种自然权利,这种天赋权利的不容剥夺和不可侵犯。这种观点对于自由的权利是否有限,却并未论及,也就是说,这种新闻自由观是无限制性的,不附加任何义务。如果了解一下16世纪

至17世纪欧洲其他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关于自由的哲学论述,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天赋论的无限制性。近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人生来就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性动物,倾向于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在自然状态下,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受任何宗教与法律的限制,这是著名的荷兰自然法学派理论家斯宾诺莎的观点。“天然的状态(即自然状态)在性质和时间方面,都先于宗教。……我们必须把天然的状态看成既无宗教也无法律的,因此也就没有罪恶和过失。……我们认为的自然状态是先于缺乏神圣启示的律法与权利,……也是因为人人生来就赋有自由”^[5]⁸⁷。无限制性的天赋论在最初对抗严酷的书报检查制度、争取新闻出版自由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必然显示出片面性和局限性。

2 法律限制的新闻自由

随着新闻自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天赋人权的无限自由观被有限自由论所取代,即18世纪初出现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其代表人物就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6]。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孟德斯鸠的新闻自由观建立在自由的法治思想基础上,人们享有的新闻自由权利要受到国家法律的束缚,这就把新闻自由思想提高到了理性层次。1789年8月,法国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第11条宣布: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换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拥有自由说、写及出版的权利。只要在法律限制范围内,担负起此项自由的责任。正因为有新闻自由,才需要有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的法律;而防止滥用新闻自由,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保护真正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意味着在法律范围内媒体具有免于外部强制力的干涉而自由

地传递不同思想和观点的权利。

虽然新闻自由思想最早在欧洲大陆萌芽、发展,但真正从制度上得以确立并受到法律的保护还是在 18 世纪后期的美国。1791 年,美国最终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又称人权法案,该法案明确宣布: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至此,第一修正案成为美国新闻自由最权威、最高的法律保护。这一时期的新闻自由权利在美国得到了极度的张扬,《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主张,人民有权自由地批评政府,即使这个批评不对,政府也不应该加以禁止,更不应该治罪。新闻自由不能限制,人民的智慧足以经得起新闻自由的滥用,从而去辨别真理和谎言。杰弗逊倡导的新闻自由高于一切的理论在美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但这种对自由滥用而不加任何限制的做法使他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幸也沦为报刊新闻自由滥用的受害者,在饱受了对立党的报刊污蔑诽谤之苦后,杰弗逊终于感叹:“我再也不相信报纸了,真理装到这种毒器里,也会变成谬论”^{[7] 355}。没有任何约束的新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新闻报道没有造假的自由、说谎的自由,法律对自由是合理的限制,它可确保享有新闻自由的主体把自己的言行限制在有利于社会 and 他人安全的前提下。即使有宪法的保护,美国国会还是在 1927 年和 1934 年分别制定了《无线电广播法》和《电讯法》,对出版自由进行限制。法律规定,任何电台和电视台在营业前必须获取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发的经营许可证,要受到这么几个方面的审查: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是否有成立的必要性;是否播放一定数量的非营业性节目;是否留有适当的时间用于讨论公共问题和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意见;广告的数量是否适当^{[2] 19}。不仅如此,经营许可证也并非终身制,每隔几年要重新申请。从这一点上看,新闻自由权利的有限性在美国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

“报刊的四种理论”指出,在自由主义理论下,报刊运行以诽谤、淫猥、煽动暴乱和叛乱的言论为禁忌,当出版物以严重的、露骨的、可证明的方式侵犯了公众的个人权利或主要的社会利益时,法律则担负起限制的责任。为了防止滥用新闻自由危害国家和公众利益,各国的新闻法律对新闻报道和评论作了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多有少,执行过程也有宽有严,但国家安全法、诽谤法和隐私法却是大多数国家所共同的。以国家安全法为例,新闻媒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危害国家安全,这在各个国家都有法律

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 条规定:“禁止公开传播一切诽谤和煽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字和图像”,第 4 条规定:“禁止公开传播一切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文字和图像”。“英国制订了《公务机密条例》,严禁新闻媒介泄露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在法国,如果新闻媒介刊载政府认为危害国家内外安全的消息,政府有权没收报纸、取消广播电视节目,甚至逮捕有关记者、编辑”^[8]。从媒体角度说,新闻自由是它的立身之本,这方面的权利越大,越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媒体总是通过发布最新、最快的消息取悦于受众;而在政府看来,在政府采取行动之前或决策没有成熟之前泄露消息,往往会损害国家利益,那么对媒体的限制是必须的,在媒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后者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对那些企图损害国家利益的新闻活动,法律从来没有放弃过惩罚。在任何制度完善的国家,只要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王朝“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法律限制新闻自由都是一种积极的限制,引导人们去追求正当的利益,从而获得更多、更有效的自由;否则,没有法律约束的自由,就等于每个人手中有一把刀,可以随便杀死任何一个比自己弱小的人。受到法律限制的新闻自由是社会公正给予媒体的约束,使它既能正确使用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会尊重别人的权利。

3 社会责任限制的新闻自由

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了新的理论,即社会责任论,新闻自由应以社会责任为规范。这个理论由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于 1947 年提出,针对在第一修正案保护伞下严重泛滥的新闻自由危机,美国一批学者组成报刊自由委员会,对报刊自由的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调查,提出了新的见解:报业自由的放任主义是有害的,报道新闻要正确而有意义,报刊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报刊自由委员会在各种出版物中极力宣传这种思想,很快社会责任论在新闻界流行起来,而且开始风行西方各国。社会责任论下的新闻自由观是对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的补充,媒体报道新闻,表达意见,并不止于在法律的限定内说出事实真相,还应出于更良好的动机和更高尚的目的。良好的动机和高尚的目的就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的要求,即新闻自由要受到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的限制。2002 年俄罗斯莫斯科剧院发生人质绑架事件,事后俄罗斯媒体签订了一份反恐公约,强调恐怖事件中媒体要

发挥自律精神,遵守救人与人权先于言论自由的原则。2004年,北奥塞梯共和国发生人质绑架事件,俄罗斯媒体工会紧急发表声明,希望媒体能够遵守两年前联合签署的反恐公约,发布新闻要考虑到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不妨碍救助行动为优先考虑,亦即救人与生命人权先于言论自由。但遗憾的是,仍有记者不分轻重,什么都报道,包括救援人员的分布、人质的身份情况,为匪徒提供了重要情报,间接导致了数百人伤亡的惨重后果^[9]。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一些英国思想家关于自由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责任论产生的哲学基础。托马斯·格林提出了和传统自由主义有别的“积极自由”的概念,即“一种从事或者享受任何从事或者享受的活动的权利或能力,也意味着某种我们与其他人共同从事或者享受的活动”^{[9] 170}。托马斯·格林认为,个人利益只有从公共利益的满足中得到满足,人们必须意识到每一个人对自由的获得,或者说每一个人获得它的过程都是对其他所有人获得这种东西的贡献,否则社会生活都将继续是一场战争。霍布豪斯认为,自由与其说是一种个人权利,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的必要;自由不是建立在甲的权利不被乙干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乙把甲当作理性动物的责任上;这样,自由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责任;一切自由权利依存于社会关系的精神性质和公共利益的合理性质^{[7] 373}。依据自由的社会整体性,霍布豪斯提出国家应当积极发挥作用,更广泛地干预社会活动,为每个公民自由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社会环境。新闻自由的约束在于人们不能有节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一个人想自由地发表意见,那么就有义务尊重别人行使这一权利,即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必须与别人的权利以及社会利益相平衡。

大量事例证明,在媒体高度商业化的今天,新闻自由的驱动力往往是经济利益,而非民主。大众媒介的职责在于挖掘事实,向人们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管理,但新闻报道的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倾向使得媒体越来越成为展示冲突的舞台,却不能为公众提供可靠、有效的途径以便了

解和掌握这个世界。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新闻报道只重视事件的戏剧性而忽视了深度,只关注了人们的兴趣点而放弃了社会重要性,只有常规的八股文式的报道而缺乏有见地的分析”^{[10] 12}。这种只“注重犯罪的细节、受害者的眼泪以及亲属们的悲伤,而不是对犯罪趋势、源头以及解决方法进行分析”^{[10] 13}的报道方式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共健康问题。媒体必须以社会责任为规范,报道新闻应正确而有意义,社会责任论从理论上修正了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诸多缺陷,指出了当代新闻自由的发展方向。

4 结 语

新闻自由应以社会责任为规范,受到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业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个话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共利益免受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体及广大新闻从业者提高自律意识,对报道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和限制,使新闻报道达到高尚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 郑保卫. 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2] 谢岳. 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 [3] 郑保卫. 新闻学导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4] 顾潜. 中西方新闻传播: 冲突·交融·共存[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5] 欧阳英. 走进西方政治哲学[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6]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7] 刘建明. 当代新闻学原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 [8] 李良荣. 新闻学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1999.
- [9] 赵志立.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冲突[J]. 当代传播杂志, 2006, 21(6): 16-17.
- [10] W·兰斯·班尼特. 新闻: 政治的幻象[M]. 杨晓红, 王家全, 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